

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

——走近金庸



□ 李秀潭

我不太喜欢读武侠小说，但却收藏着一轴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书法墨宝。

金庸先生这件书法作品是送给友人的草书条幅。内容是虞世南咏《蝉》诗中的名句“居高声自远”。虞世南，唐初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被唐太宗称为“五绝”：一曰忠说，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词藻，五曰书翰。虞世南这首咏蝉绝句，寓意君子应像蝉一样，只要自己立身品格高洁，不必凭借权势地位的“秋风”（“非是藉秋风”），而自能声名远播。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云：“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诗人笔下人格化的“蝉”，带有自况意味。金庸先生书写此句送友人，表达了他对人内在品格的赞美和自信，呈现出一种雍容不迫的气度和风韵。

生于文宦之家

金庸，学名查良镛。后来写小说，把“镛”字拆开，笔名“金庸”。我国香港著名报人、武侠小说家。

金庸出生在以海潮出名的浙江海宁。海宁自古人丁鼎盛，被誉为“文化之邦，藏书之府”。近代史上著名人物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都是海宁人（其中蒋、徐是其亲戚）。明清两代，海宁查氏科甲鼎盛，人才辈出，成为江南有数的“文宦之家”。仅康熙时查家就有10个进士。其先辈查慎

行、查升都是翰林。查慎行是清朝第一流诗人。查升以其人品和书法深得康熙赏识，入值南书房达38年之久。祖父是光绪时进士。父亲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受过西洋教育。这先天优越的家庭环境，使他在书香中度过了童年时代，从而也培养了他终生爱读书的良好习惯。

但是，就在他学习的少年时代，卢沟桥烽火燃起，八一三炮响，家乡海宁嘉兴地近前线，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从此，他随学校逃难辗转江西、湖南、湖北、四川，踏上了乱世求学之路。1943年，金庸考进国民党“党的最高学府”中央政治学校。但因表达对学校管理制度的不满，被学校勒令退学。后在蒋百里侄子、他表兄帮助下，进中央图书馆工作，使他得到一个大量读书的机会。抗战胜利后，历经战火蹂躏的家境，不允许他继续求学。他在投稿时认识的忘年交编辑推荐下，进入杭州《东南日报》工作。从此，他踏进了报界大门，并终生与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7年10月，他考取上海《大公报》电讯翻译，迈进了在中国百年报业史上以敢言著称、在动荡乱世始终坚持“文人论政”传统的《大公报》大门。《大公报》老报人的精神气质，对金庸一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1947年底，《大公报》生存空间越来越窄。为保存《大公报》事业，报纸创办人带领一批骨干奔赴香港，着手筹备《大公报》香港版复刊工作，金庸随之南下。这是他命运中最大的转折。从此，他的人生在这里展开。他在香港生根、成家、创业、办报纸、

写小说，建立起自己的事业大厦。

纵横三界江湖

香港这个国际化、商业化大都市，是金庸安身立命、成家立业之宝地。他在这里创办《明报》，短短几年，就从娱乐性小报崛起为香港三大中文报纸之一，成为香港乃至中文报业史上的一朵奇葩。他在这里撰写出版武侠小说，风靡两岸三地乃至海内外中华文化圈。他以武侠小说和《明报》登上香港亿万富豪榜。他头上戴有报业巨子、武侠小说大师、社会活动家等桂冠。鲜花和掌声把他送上了“金庸神话”的巅峰。但是金庸就是金庸。在这诸多炫目光环的背后，他终其一生，骨子里还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中国文人。他的小说、政论，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产物。

首先，从他的武侠小说来看，自1955年第一部《书剑恩仇录》问世以来，直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之后宣布“封笔”，前后17年共写武侠小说15部。武侠小说给他带来巨大声誉。华人社会雅俗共赏，老幼咸喜。凡是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都知道他的名字。“金庸”这个笔名，甚至淹没了创立《明报》的查良镛。据权威人士透露，邓小平和蒋经国，晚年都是金庸武侠小说的爱好者。以研究武侠小说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金学”，也成为显学。

金庸武侠小说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学界、文坛褒贬不一，对其在中国通俗文学史上的地位，见仁见智，备受争议。总体上看，它既有香港社会高度商业化、市民化、娱乐化、通俗文学的特征，又包含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人情风俗，具有较丰厚的文化内涵和较高的文化品位。金庸小说，卷舒历史风云，感慨苍茫人生，其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际（如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此种关注国家兴亡的思路，既有基于他本人早年乱世经历的体验思考和政论家的人生感慨，又反映了世间的人生真实，充满人道关怀。他通过

系列栩栩如生的侠义人物，洞察人性的幽微变化曲折，刻画人性的复杂丰富，揭示了中国传统儒家的精神价值和政治理想。不同的人看他的小说有着各不相同的视角，侠义、情爱、历史、政治等。但最终他们都能在千百个不同类型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中，读出中国文人追求真善美的传统美德，安身立命的人生哲理，浓厚强烈的家国情结，深入骨髓的人文情怀，启迪后人的历史智慧。这是他在浓郁商业化氛围中写作的武侠小说风行不衰的根本原因。在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之上，人性是永恒的。

武侠小说不是金庸的全部。《明报》和他的社评，在他生命中无疑占据更重要地位。那是他一生的事业。仅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没读过查良镛的社评，看到的是一个不完整金庸。在金庸的黄金岁月，他两手写文章。白天在渣甸山书房写小说，揄扬千古侠风；晚上在《明报》办公室写社评，褒贬现实政治。写武侠小说，最初只是出于商业动机，为了招徕读者，扩大报纸销路。后来报纸打开局面后，他就把兴趣集中到写社评上，评论国家大事，剖析世界风云。金庸的社评，秉承中国近代王韬、梁启超办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以他锐利的“新闻眼”，谈史论政，纵横捭阖，深具见地，独步文林，表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气节和远见卓识，实现了“文章报国”的初衷，为海内外识者称颂，开启了以政论闻名的查良镛年代。

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英联合声明》。1985年4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国政府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邀金庸以记者身份参加基本法起草委员会。1986年9月，基本法草委会决定下分5个小组。他和北大法律系主任萧蔚云教授被任命为“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负责召集、主持政制小组会议，协调小组工作。从此，办了一辈子报纸，写了17年小说，年过花甲的金

庸，又倾注极大的热情，参与全国政治，为香港推行“一国两制”构想尽心尽力，贡献自己的政治智慧。

在此期间，金庸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为实现中华民族和平统一而忙碌奔走。在两岸的官员、学者中，都有金庸的小说迷。他是“海峡两岸都吃得开”的人。他不仅是台湾的常客，而且三度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1981年与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会见，1984年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会见，1993年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其后发表之谈话记录，无不流露出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民生和民族命运之情操。

不改书生本色

金庸是个色彩斑斓、具有多重性格的人。他身处文学、新闻、政治三大江湖，应付自如。他身居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精通外语，长期接受西方文明的浸淫影响，饮威士忌酒、吃牛排成为生活习惯的一部分。他生在商业时代，身处商业社会，作为一个世俗中人，他属于红尘，不属于天国，无法超越尘世的网罗，无所逃于对功利和金钱的追求，孜孜矻矻使自己成为商业社会成功的报人、作家和企业家。但从更深层面看，他又出身在一个破落的旧士族家庭，从小在儒家经典熏陶下成长，从遗传密码和土族的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他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根深蒂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儒家尊崇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情怀。他一生博览，坐拥书城，学贯中西，其毛衣胸前英文词意为“读书”。他对中国传统的儒学、佛学甚至琴棋书画，都有相当精深的造诣，具有浓厚的文人情结。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综观金庸先生其人其文其行及其作品折射的精神世界，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生命底色包裹的还是一颗传统的中国文人的心灵。

未已斋札记

有所思

南书房的酱缸

——古都风物可感 旧时风气可叹

□ 胡森森

心，名曰“倅倅桌子”，桌子长约三尺余，宽约二尺，最矮者摆三层点心，高者21层，每层需要200余块点心，都是大内倅倅房所造。点心祭祀完之后，往往分给妃嫔、宫女、太监等，名曰“克食”。

这么多点心肯定吃不完，就有人动起了这方面脑筋，有太监专门收这些点心，用来造酱，点心中都是高面、白糖、奶油，造出酱的味道很好，太监就用来给亲贵王公大臣送礼。来而不往非礼也，送五斤酱，还能得十两银子赏赐，成为造酱太监的一大笔收入。造酱动辄十缸八缸，无处摆放，就有人打起南书房的主意。南书房以前是诸位皇子 and 亲王之子读书的地方，但是咸丰之后只有一个皇子在宫中读书，这里闲置无用。太监便把酱缸摆在南书房前面廊下。

南书房距离乾清宫虽远，但东南风起来时，吹送的味道满院可闻，想想中国20世纪80年代酱油醋厂的发酵味道，就能感同身受。更要命的是，庚子赔款之后外国使臣觐见很多，南书房空闲无用，成为外国人落座等候的地方。老外到此人人掩鼻，实在是有害国体。于是总理衙门的人几次与军机大臣商量，把酱缸挪个地方。

可是，在那时的中国动一个桌子都不容易，何况是利益相关的大酱缸呢。太监都是慈禧太后那里的人，官员怕得罪他们，也不敢坚持。十几年过去了，酱缸依然如故，居然一直保存到民国。见微知著，一件如此轻易的事情都无法改良，可见满清政权衰败透顶了。

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干

齐如山，与王国维、吴梅并称为戏曲研究三大家。齐如山对梅兰芳扶持有加，一手推动了梅派艺术的形成和成熟，京剧界有“赏梅勿忘齐如山”之语。晚年的齐如山寓居台北，丹青不知老之将至，而思乡怀乡之情越来越浓。这份故土难忘、故人难舍、故事难了的岁月情缘，促使他全凭记忆，用一支笔写下了《北平杂记》，记下了古都北京的旧时风物，其中有典故、有器物、有逸事花边、有民风厚朴，当然也有新旧时代交替下的腐败与衰退迹象，令人不胜感慨。

腐败一词仅就字面意义而言，是指食物因日久而变质。《史记·平准书》中有“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之语，当是这一概念的源头。《北平杂记》中多处出现对于腐败的批判和揭露，这里的腐败含义很广，有时是指克扣钱粮、监守自盗的犯罪行为，有时是指道路失修、推诿扯皮的不良政风，有时则是指不成体统、逾越礼法的荒唐事件。譬如东华门下门洞内的兵丁杂役，大清早本应该站班盘查巡街，却因为怕冷就地横躺在被窝里，在枕头上冲路旁的行人大喝盘问，成为一时笑谈。这样缺乏精神的民族，被时代车轮抛弃甚至碾压，也不足为怪了。

台湾学者柏杨曾将中国文化比喻为“大酱缸”。在齐如山的回忆里，酱缸就不是比喻，而有着清晰的形象，而其背后连接的就是腐败的官廷文化。御前侍卫“津五爷”就对齐如山讲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而极为腐败的事情”。说起来事小，每逢节日或皇帝后妃的生日，都要上供祭祀，满洲人的习惯是要摆一桌点

（上接1版）

稳中求进是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工作实践表明，若在指标上一味求进，追求速成，经济建设很容易遭受重大挫折。相反，坚持稳中求进，即便经济运行遇到巨大困难，也能将其克服，取得较好经济增长绩效并为未来发展创造潜力。1998—2002年期间，面临外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国内国有企业举步维艰、金融风险大规模暴露等严峻挑战，中央坚持稳中求进，大力推动国企、金融、住房等领域改革，扩大开放加入WTO，在深化改革开放和调整结构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不仅稳住了经济运行，还为2003—2007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稳中求进也是应对目前国内外不确定性的战略思维。一方面，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仍未消除，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疲软；去全球化思潮抬头，贸易、投资保护主义阴霾仍未消散；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仍在攀升，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可能冲击全球金融稳定，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仍然不少。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企业预期逐渐向好、市场信心不断增强，金融风险有序化解。不过，经济运行仍面临下行压力，内生增长动力还不够强，金融领域“灰犀牛”风险依然存在。面对国内外环境可能存在的负向变化，需要有底线思维，通过稳中求进为可能出现的冲击预留缓冲和腾挪空间。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预期增速目标一直坚持留有余地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能稳中求进

稳中求进的基本前提是能“稳住经济运行”。有一种错误的“硬着陆论”观点认为，中国很难稳住经济运行，不能稳中求进。在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情况下，这种“硬着陆论”仍在一定范围内流

行，根源在于忽视了中国的三大核心优势，即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优势和大国优势。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史，经济可持续发展总体上靠技术进步和制度革新的双轮驱动。后发优势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构成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源源不断的潜力。体制可改革性优势为制度改革提供最重要的保障，使后发优势所蕴含的潜力得以释放。大国优势则意味着较强抗风险能力，充足的“试错”空间，为发挥后发优势和体制可改革性优势创造条件。

稳中求进有后发优势的支撑。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仍属于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的技术、产业平均水平与世界技术、产业前沿仍有明显差距，仍具较强后发优势并蕴含了较大增长空间。即便世界技术、产业前沿拓展速度显著降低，后发优势的存在也可以保障中国具有保持相对较快技术进步速度的潜力。重要的是，一个国家政党、政府是否具有稳定强大的执政能力、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是其发展的先决性条件，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可以确保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后发优势所蕴含的潜力不断释放。有人担心，与成功追赶型的较小型经济体不同，超大经济体后发优势的释放会受制于全球需求空间，中国块头太大，国际市场难以容纳后发优势的充分释放。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既没有认识到大国本身的内需可以构成巨大支撑，也没有认识到中国正致力于推动全球包容性增长。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开放包容为特征，以互利共赢为追求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国希望通过促进全球增长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共同发展来实现自身发展的集中体现。

稳中求进有体制可改革性优势的保障。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制度唯有不断革新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受特定利益群体的影响，任何一种制度本身都可能存在蜕化的自然倾向。另一方面，有益于过往发展阶段的制度不一定能够适应新的变化了的环境。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在体制可

改革性方面表现出了明显优势。首先，中国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认识，也在全体中国人的脑海中打下深深烙印。其次，政治生态的净化为改革提供了好的环境。改革的探索或实施需要有为干部，需要政治领域的企业家。反腐的深入推进，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的营造，有利于将领导干部的精力吸引到推动制度创新上，有利于形成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良好氛围。最后，当前遇到的矛盾和挑战也有利于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古今中外的改革实践表明，改革共识较难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受到不当观念的束缚。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只有通过实践的演进和现实的教育才能得以打破。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因素的弊端越来越充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改革的必要性和方向也就不言自明了。

稳中求进有大国优势的护航。首先，大国抗风险能力较强。由于经济体量大、内部市场大，在外部冲击下，通常具有更大的回旋余地，经济波动性相对较小。只要宏观政策不出现重大失误，中国完全能够应对和承受各类风险冲击。其次，大国有利于释放后发优势。后发优势释放不是对国外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简单照搬，也伴随着大量的创新。总体而言，大国的创新生态相对较好。庞大的经济规模及其伴随的多样性，为初创企业挑战现有大企业留下了更大的空间，保障了较强的企业纵向流动性，即创新型从小变大的可能性。最后，大国在体制可改革性方面更具优势。当改革本身蕴含较大风险时，大国的幅员辽阔为改革试点提供了广阔的“试错”空间，有利于通过试点总结经验，控制风险，降低成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之所以保持了较强的体制可改革性，正是由于充分利用了大国优势，通过地方或局部改革试点实现了对改革风险及成本的有效管理。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